

黎巴嫩局势演变及影响

董漫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中东基本矛盾、黎叙关系、真主党、伊叙“特殊关系”

〔提要〕黎巴嫩处于中东敏感地带，长期动荡，国内问题历来与地区主要矛盾相交织。叙利亚撤军后，黎局势发生较大变化，美国强化了介入，并将此作为最终更迭伊朗和叙利亚政权全盘计划的组成部分。伊叙不甘坐以待毙，对美采取一系列牵制措施，以维持政权生存。黎已经成为伊叙与美较量的舞台之一。

〔中图分类号〕D837.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06)06-0047-06

〔完稿日期〕2006年9月20日

一、黎巴嫩局势演变历来与中东基本矛盾相交织

黎巴嫩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东部和北部与叙利亚相连，南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面积 10,452 平方公里，人口 400 万（根据黎官方 2005 年的统计）。该国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人，但宗教信仰差别很大。54% 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另有 46% 的民众信奉基督教，主要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1〕}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1943 年 11 月 22 日获得独立。

黎巴嫩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居民宗教信仰的差异性，长期被卷入中东地区战乱与矛盾的漩涡之中。自 1948 年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至今，黎

多年不得安宁。四次阿以战争波及黎巴嫩。以色列于 1978 年、1982 年和 2006 年三次大举入侵黎巴嫩。从 1985 年 1 月至 2000 年 5 月，以色列在黎南部地区开辟“安全区”，实行了长达 22 年的武装占领。至于黎以边境地带发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则不计其数。此外，黎自 1975 年至 1990 年期间发生内战，生灵涂炭，满目疮痍。

上述所有与黎巴嫩有关的战争与冲突，都与中东地区的基本矛盾相交织并予以鲜明反映，构成了中东长期动荡的组成部分。这些基本矛盾是：（1）阿以矛盾，即中东地区的主要民族矛盾，包括巴以矛盾，叙以矛盾，黎以矛盾，广大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矛盾。仅以巴以矛盾为例，就可从一个侧面说明阿以矛盾。1970 年约旦“黑九月”事件后，巴解“法塔赫”暴风突击队主力和其他派别武装，不得不撤出约旦，辗转进入黎巴嫩，开始以黎巴嫩

为基地开展反以武装斗争,逐步导致以军于1978年3月采取“利塔尼行动”,首次入侵黎巴嫩,直逼首都贝鲁特,占领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同年6月撤出),并继而于1982年6月再次大举入侵黎巴嫩,将巴解“法塔赫”派主力驱赶到8个阿拉伯国家。此后,“法塔赫”一部及“人阵”、“民阵”等非主流派武装组织陆续重返黎巴嫩,^[2]以难民营为依托,继续高举反以大旗,谋求恢复元气,直至今今。(2)阿拉伯民族与美欧列强间的矛盾。历史事实证明,美欧是阿以矛盾的主要制造者和推波助澜者之一。在阿以冲突面前,美国一贯奉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曾长期偏袒以色列并蔑视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这不能不激起阿拉伯民众的愤慨。1958年,美国武力干预黎巴嫩内政,遭遇黎穆斯林民众反抗。1983年10月23日,241名美军和58名法国官兵在贝鲁特被炸身亡,美、法被迫撤军,中止在黎的“维和”行动。(3)世俗力量与原教旨主义势力的矛盾。黎自独立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是世俗政权。除1982年成立的真主党外,所有政党都是世俗政党。从政治与价值诉求看,历届政府和所有世俗政党都不希望黎演变为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在真主党出现前,历届政府都动用国家强力压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崛起。但是,由于阿以冲突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现象比比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制度模式在贫苦的什叶派穆斯林中引发崇拜,真主党的社会基础愈加牢固。黎内战期间,政府军、基督教各派武装、^[3]逊尼派武装、^[4]什叶派“阿迈勒”民兵、^[5]德鲁兹民兵、^[6]巴解反对派等,都与真主党交过手,无法迫其就范。于是,各方各派只得接受真主党生存与壮大的事实。真主党的最高目标是推翻黎世俗政权,建立伊朗式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因此,黎孕育着世俗力量与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最终较量。(4)教派矛盾,包括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的矛盾,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从1943年黎各派达成《民族宪章》起至1975年内战爆发,黎国内教派矛盾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的矛盾。内战期间,伊斯兰

教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激化,与伊斯兰教派同基督教派的矛盾相交织,集中表现为亲叙利亚力量与反叙力量之间的搏杀,经历了叙支持各派穆斯林武装与基督教武装交战、叙支持各派穆斯林武装压制巴解主流派坐大、盖亚盖亚领导的基督教民兵“黎巴嫩力量”暂时投靠叙利亚,逊尼派与什叶派武装争地盘、叙支持什叶派“阿迈勒”民兵与真主党厮杀、德鲁兹民兵与逊尼派武装联手与“阿迈勒”民兵激战、各派穆斯林武装与“黎巴嫩力量”较量、基督教武装内讧等阶段。

黎国内局势演变过程中暴露出的如上矛盾,中东地区普遍存在。自黎内战结束至今,这些矛盾仍然存在,并深刻影响黎国内政局走向。

二、黎叙“特殊关系”是影响黎局势发展的关键因素

历史上,黎叙是一个国家。黎独立后,叙未予承认,叙黎一直保持“特殊关系”。黎内战爆发前,美国和法国在黎有重要影响,支持基督教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穆斯林人口超过基督教人口,各派穆斯林武装迅速壮大,于是要求改变《民族宪章》规定的权力分配格局,^[7]黎内战因此而爆发。面对黎内战,阿盟决定干预,叙主动要求向黎派兵。阿盟通过决议,同意叙武力干预黎局势。这样,叙出兵黎巴嫩有了“合法依据”。从此,黎一步步被叙控制。

长期以来,黎叙“特殊关系”有如下特征:(1)叙对谁出任黎总统、总理、议长等要职有“咨询”和“建议”权,事后结果与“咨询”和“建议”完全一致。(2)黎在对外关系上与叙外交保持一致,特别是在与谁结盟、与谁对抗、如何应对地区热点等重大问题上。(3)黎叙间无正式外交关系,这是叙致力于未来两国“合并”的关键铺垫。(4)黎如何对待包括真主党在内的境内武装派别,须征得叙“认可”。

黎内战时期,因受到美苏等外力制约,叙一直不能放开手脚决定黎命运,只能在黎各派间发挥操控作用。例如,上世纪70年代初,巴解主流派转进黎巴嫩后,叙曾提供支持,开始培植亲叙势力,

导致巴解“派中有派”，最终分裂。1970年老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掌权后，叙对黎各派穆斯林武装提供全面支持，使穆斯林与基督教武装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进而使黎爆发内战的条件成熟。内战初期，叙支持巴解各派和穆斯林武装与基督教武装较量。1976年4月，叙在主要阿拉伯国家和阿盟同意下，直接出兵介入黎内战，此时，各派穆斯林武装已经控制黎2/3的国土，叙转而开始打压巴解主流派。1978年3月至1982年6月，以色列两度大举入侵黎巴嫩，驻黎叙军遭以军打击，遂与巴解和穆斯林武装一道抗以。1983年12月，叙策动穆萨中校率“法塔赫”分裂派反水，与其他亲叙巴勒斯坦武装联手打败巴解主流派，并将其有生力量逐出黎巴嫩。内战后期，叙利用基督教派内讧，支持盖亚盖亚与奥恩军政府决战，后者大伤元气。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叙支持美打压萨达姆，愿出兵加入美领导的多国部队（后来参加海湾战争），得到美赏识。作为交换，美默认叙于同年10月对奥恩军政府发动总攻并将其推翻，结束了黎内战。

黎内战结束，标志着叙完成对黎的全面控制。黎叙“特殊关系”全面深化。1991年5月，黎叙签署《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与防务条约》，确定结盟和军事互助关系。1996年1月，黎叙签订经济一体化、取消双重税、推进和保证投资、建立联合边界哨所和社会领域合作五项协定，双边关系朝着未来“合并”方向发展。同时，双方决定在与以色列谈判中密切配合，决不单独与以媾和。

“9·11”事件后，美国打出“反恐”旗号，先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出台“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一手打击伊拉克反美武装，推动巴以和平“路线图”的实施，一手加大对“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的整治力度，叙与伊朗一道，成为美施压对象。2004年9月2日，美、法等国推动安理会通过1559号决议，要求叙从黎全部撤军，并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同月，叙撤军3000人。2005年2月，黎前总理哈里里遇害，美等西方国家和黎反叙派指责叙应对此负责。3月，

“黎巴嫩之春”运动出现，百万民众在贝鲁特举行反叙游行，^[8]包括奥恩在内的反叙政治家纷纷回国，角逐大选。迫于压力，叙于4月25日全部撤军。6月，黎大选揭晓，哈里里之子萨阿德·哈里里领导的“未来阵线”竞选联盟获议会128席中的72席。包括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在内的亲叙力量仅获35席。“未来阵线”指定西尼乌拉出任黎新政府总理，黎叙关系进入调整期。

叙虽撤军，但对黎国内局势走向的影响仍在。拉胡德总统高度重视黎叙关系，叙全力支持拉巩固政治地位。2004年9月，在叙影响下，黎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延长拉胡德总统任期3年。从目前状况看，真主党、“阿迈勒”运动、巴解非主流派，是叙赖以维持对黎影响的主要社会基础。

三、真主党坐大强化了伊朗对黎局势发展的影响

伊朗是波斯国家，历史上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很深，这种矛盾今天仍在发展。除叙利亚外，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对伊朗高度警觉。叙伊之间保持“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源自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长期矛盾和伊朗对伊拉克的长期防范。自20世纪60年代起，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为争夺对阿拉伯复兴运动的领导权而反目。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叙是阿拉伯世界中惟一支持伊朗的国家。叙利亚与黎巴嫩同时保持“特殊关系”，黎是世俗国家，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深厚，黎不喜欢伊朗的原教旨主义制度，但由于长期受叙控制，不敢公开抵制，也无力抵制。能使黎、叙、伊在国家关系层面形成关联的因素是真主党。

黎穆斯林民众的多数是什叶派，长期处于贫穷和受压迫地位，渴望社会公正，对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对1943年以来的国家权力分配格局不满。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在黎什叶派穆斯林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他们希望黎也能成为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伊朗借1982年6月以色列大举侵黎之机，派遣一批伊斯兰传教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教官，潜入黎南部地区和贝卡谷地，以启迪什叶派穆斯林“反抗以

色列占领”为名,输出“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推动下,黎境内的“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伊斯兰大学生联盟”等组织合并成立真主党。

真主党成立后,首先与“阿迈勒”民兵争夺什叶派穆斯林的领导权。“阿迈勒”民兵的政治组织是“阿迈勒运动”,系世俗化武装政治集团,反对在黎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制度。双方火并8年,直至内战结束,谁也未能吃掉谁。为了打败“阿迈勒运动”,真主党曾与巴解各派结盟,与之厮杀。1991年以来,这两大组织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撮合下,高举“反抗以色列占领”和“为什叶派穆斯林谋福利”的旗帜,达成政治联合,共同角逐黎国内政治权力的分配,构成黎境内主要的亲伊亲叙势力。2005年大选中,“阿迈勒运动”赢得议会15席,真主党14席,两派都有要员在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两派的行为区别是:“阿迈勒运动”从未对以色列发动过主动袭击,真主党从未放弃主动对以发动袭击。从趋势上看,真主党的政治影响处于上升阶段,“阿迈勒运动”在走下坡路。

真主党是在战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武装政治集团,内战期间,几乎与黎所有武装派别都交过手,也与政府军多次爆发激烈战斗,事实证明,黎国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剿灭真主党。黎内战结束以来,黎所有武装派别都被收缴了重武器,多数被解散,惟有真主党例外,不但可以保留全部轻重武器,还可以继续扩编队伍。真主党把巴勒贝克及贝卡谷地、黎南部和贝鲁特西区变成国中国,所控区域内有自己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有宗教学校和军校,霍梅尼巨幅画像赫然矗立,慈善和社会救助体系有效运作,有电台、电视台、报纸和因特网站,有伊朗提供的较为充足的活动经费。为了随时能够对以发动袭击,多年来,伊朗向真主党提供了包括短程导弹和“喀秋莎”火箭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经叙利亚转运给真主党。为了维系叙伊“特殊关系”,叙一直阻挠黎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真主党是伊朗重要的政策工具,总能在伊最

需要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2000年巴以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后,在伊朗支持下,哈马斯与真主党达成战略协调协议,伊开始同时向二者提供援助。此举使伊获得了牵制美中东战略推展的有效手段。今年初以来,美抓住伊核问题不放,企图武力更迭伊政权铺路。伊核问题由此引起国际关注。在这个关键时刻,真主党于7月12日主动向以军哨所发动袭击并俘获两名以军士兵,引发长达34天的军事冲突,既缓解了以军“夏雨”行动给哈马斯造成的压力,也把世界的目光引向阿以冲突。在此番与以军的较量中,真主党化整为零,频频反击,造成以方百余人伤亡,且自身有生力量未遭重创,显示了顽强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名声大振。战后,真主党拨付上亿美元资金,为所有房屋被毁的家庭每家补助12 000美元,折射出了伊朗对真主党的慷慨。相比之下,黎政府的反应软弱无力,国家财政竟无钱救助百姓,声望受损,执政能力遭到进一步削弱。

四、黎巴嫩成为伊叙与美国较量的舞台

叙利亚虽然已从黎全部撤军,但仍能对黎局势走向施以关键影响。加之叙伊“特殊关系”深化,黎便成为叙伊两国与美国较量的重要舞台:

(1) 伊朗现政权面临的重大威胁是,美国可能发动的战争。战争目的是改朝换代。实现核计划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但这需要时间,不能马上奏效。伊深谙,美目前因为受到多种牵制,特别是在中东捉襟见肘,无法集中资源和精力规划并发动战争。因此,现阶段最有效的自保方式是继续在中东地区给美制造各种难题,包括恢复输出“伊斯兰革命”,使美疲于应付。把黎巴嫩变成美的一块心病,是牵制美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继续扶植真主党,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真主党异军突起,构成对美中东战略的多层面威胁,包括随时威胁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以如还手,就会刺激阿拉伯世界民间反美和仇以情绪,加大对亲美和世俗政权的压力,使它们不敢配合美中东战略。真主党与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反美武装有联系,彼此间开展人员

交流, 互利互助。真主党与哈马斯达成战略协调, 双方都以灭亡以色列为目标, 都积极致力于挫败美式“中东和平进程”。真主党的最高目标是在黎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制度, 自己独家掌权, 将来与伊朗一道向整个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事实上, 黎国内各种力量都无法阻止真主党分享国家权力, 更无力根除它, 只能坐视它的政治和宗教影响日益扩展。从实际作用上看, 真主党已经构成美国和以色列的心腹之患。

(2) 黎巴嫩是践行叙伊“特殊关系”的主要舞台。伊拉克战争后, 叙利亚与伊朗的“特殊关系”, 成为影响中东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美与叙伊间的矛盾, 上升为地区的突出矛盾。叙利亚早就被美扣上“无赖国家”和“支恐国家”的帽子, 更迭或“改造”叙政权是美中东战略的目标之一。叙为捍卫政权生存, 竭力维护与伊朗的“特殊关系”。这是因为, 叙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不睦, 在阿拉伯世界处境较为孤立, 叙很难指望阿拉伯国家支持其与美抗争。在这种情况下, 叙伊“特殊关系”成为叙谋自保的坚固屏障。基于“特殊关系”框架, 叙伊可以共同整合和调配反美资源, 让它们发挥最大效力。叙目前握有几张重要王牌, 包括对哈马斯的遥控指挥、对黎巴嫩国内局势走向的关键影响、对巴解反主流派的全面控制。只要美国想重新启动“中东和平进程”各个轨道的和谈, 叙利亚的重要作用就会凸显。对于叙伊, 美不可能一并搞垮, 故面临先搞垮谁的难题。

(3) 黎巴嫩局势的演变, 引起美国关注。与伊朗和叙利亚争夺黎巴嫩, 成为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 美加强了与欧盟的协调, 特别是与法国、德国等欧盟核心国家的协调。虽然美欧之间因伊拉克战争而出现的裂痕尚未完全平复, 但在对待伊叙“特殊关系”和黎巴嫩未来走向问题上, 美欧基本利益一致, 政治与外交努力的大方向相同。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全部撤军的联合国安理会 1559 号决议, 就是美欧协调的产物。该决议同时要求黎“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公正自由地举行总统选

举, 确保国家的世俗政体, 并向“民主化迈进”, 解除真主党的武装。2005 年 2 月黎前总理哈里里遇害后, 美联合法、英推动安理会通过有关哈里里遇害国际独立调查的 1595、1636、1644 号决议, 暗示叙与哈里里遇害有关联。今年夏季的黎以大規模武装冲突爆发后, 美国公然站到了以色列一边, 支持以军对真主党展开清剿, 并认为以军是在“自卫”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1559 号决议, 将以色列的行为美化为“国际反恐战争的继续和深入”。为了拉拢黎政府和抵消真主党的影响, 美欧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出面, 游说 32 个国家同意派兵加入总数为 15 000 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进驻黎南部地区, 阻隔真主党向以发动袭击; 美在安理会 1701 号决议生效后, 立即宣布向黎提供二亿三千万美元援助, 支持黎重建及政府军在南部部署; 美欧召集援助黎巴嫩国际会议, 筹集援助款 9.4 亿美元, 超过了真主党为黎受害民众提供的资金援助, 美还敦促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富国向黎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鉴于 2005 年 6 月大选后反叙势力在黎议会占据压倒多数, 美迅速将黎定为“变革外交”^[9]的试验场, 与小哈里里领导的“未来阵线”、小琼布拉特领导的“社会进步党”、盖亚盖亚领导的“黎巴嫩力量”、基督教派“奥恩联盟”、“自由爱国运动”等势力密切接触, 鼓励它们努力争取黎巴嫩的“真正独立与自由”。

综全文所述, 黎巴嫩虽是中东小国, 但却孕育着新的动荡, 反映出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及热点问题, 成为外部势力和地区强国争夺的一个目标。黎国内局势的演变, 具有地区性影响。

注 释:

[1] 以上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可参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ybfs/gjlb/1384/1384x0/default.htm>。

[2] 目前, 黎境内以难民营为依托的巴勒斯坦组织有: “法塔赫”及“阿克萨烈士旅”分支机构、“人阵”、“民阵”、“人阵”(总部)、“巴勒斯坦全国阵线”、“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巴解阵”、“人民斗争阵线”等。1990 年黎内战结束后, 这些组织的重武器被收缴, 只被允许在难民营内保留少量轻武器, 且不准带出。

[3] 黎基督教派有三大家族, 即杰马耶勒家族、夏蒙

家族和弗朗吉亚家族。三大家族均曾拥兵自重。杰马耶勒家族有“长枪党”民兵，夏蒙家族有“自由国民党”民兵，弗朗吉亚家族有“巨人旅”。内战期间，杰马耶勒家族曾凭借装备和兵源优势吞并另两家武装，组建“黎巴嫩力量”民兵。1985年3月，时任总统杰马耶勒迫于叙利亚压力，解除“黎巴嫩力量”参谋长兼北部地区司令盖亚盖亚职务，盖率部造反，先控制整个“黎巴嫩力量”，继而击败“长枪党”民兵，成为基督教派最大的军阀。内战结束后，基督教各派的重武器被收缴，大部分民兵加入政府军。

[4] 内战期间，黎有六股逊尼派武装，即“纳赛尔运动”、“伊斯兰统一运动”、“10月24日运动”、“阿拉伯骑士团”、“圣战者”和“伊斯兰人民解放军”。内战结束后，武器被收缴并全部解散。

[5] “阿迈勒”民兵组建于1976年，其创始人穆萨·萨德尔1977年在利比亚“失踪”后，纳比·贝里继任司令。内战结束后，武器被收缴并全部解散。贝里自1992年以来一直担任黎议长至今。

[6] 德鲁兹民兵组建于1949年，其政治组织是“黎巴嫩社会进步党”。1977年老琼布拉特遇刺身亡后，小琼布拉特继任司令。内战结束后，武器被收缴并解散。“黎巴嫩社会进步党”继续活跃于政坛。

[7] 1943年《民族宪章》规定：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出任，总理由伊斯兰教逊尼派出任，议长由什叶派出任，基督徒与穆斯林议员之比为6:5。1989年“塔伊夫协议”将议员比例均摊。

[8] 见 K.Karam “Post-Syria Leban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terminants of a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ume No2, April-June 2006, p52-53.

[9] “变革外交”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由美国国务卿赖斯于2006年1月18日提出，要求美驻“敏感地区”的外交机构加强与各国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众的接触，培育“民主力量”，促成有关国家的“民主变革”。参见：<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

(上接第13页) 其三，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有相同的命运和遭遇，现在又都面临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任务，在国际上有共同的利益与立场。双方都主张和致力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任何国家建立单极独霸世界的图谋，反对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操纵和垄断国际事务；都主张尊重与维护各国的独立、主权和自己决定本国政、经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宗教等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和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西式民主和发展模式；都主张多边主义和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抵制单边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和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国际关系准则；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反对诉诸武力与武力威胁；都主张经济全球化要更多地反映和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要求，希望发达国家为帮助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多发展多做实事。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同情与支持，成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交。随着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演变，中非这种亲密朋友关系将愈益加强。

所有这些无疑将推动中非关系进一步全方位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一

些反华势力出于对中国的仇视与嫉妒，竭力挑拨中非关系，破坏中非友谊，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中国对非洲威胁论”和“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等无稽之谈。这些奇谈怪论在客观事实面前不攻自破。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决不会上反华势力的当。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批驳这些怪论说，目前有人鼓吹中国的发展对非洲是威胁，说中国要攫取非洲资源，这不是事实。乌干达坚信，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乌干达、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乌干达是中国发展的受益者。这番公正之辞反映了广大非洲国家的共识。

诚然，中非关系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如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对非援助也有限，同非洲国家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距离；少数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非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在中非之间打进楔子；“中国威胁论”在非洲仍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经贸合作的深入和扩大，双方在这一领域的矛盾与摩擦可能增多，台独势力的“银弹外交”对中非关系的干扰等。这些需要双方认真对待，慎重处理，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妨害中非关系大局。从总体看，中非发展密切关系是彼此根本利益之所在，已成为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推进的势头是不可逆转的。

PRÉCIS

A reassessment on the situation of Africa and its international role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Africa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 These chang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overall tendency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the obviously increased attention and investment give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Africa with African Union as the core in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se chang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fact that Africa is stepping into a new historical stage of seeking peace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pressure of existing contradiction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Africa is still fragile and unstable. To reach the targets set by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NEPAD), and to realize its real renaissance, Africa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China's position in it

How to intera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a country's external rela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t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change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rom opposing the western system and the Cold War system controlled by two superpowers to being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a responsible power. It is the nee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as well as the result of China's adjust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concept and its foreign policy. This chan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exp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An analysis on shared interest and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een from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depends on "shared interest". It is like an "invisible h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ich is able in coordinating or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wer, system and identity. "Shared interest" may lower the costs in transac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good information, and help ease the "prisoner's dilemma". "Shared interest" provides actors with certain scope of "shared space", and plays the role of easing pressure, shock and contradiction. It can also add to the expectation of promise and security. Since the form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shared interest" is on the basis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 or in the network, it helps standardize activities of actors, secure the fulfillment of commitment, intensify expectations on the result, and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evolu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Lebanon and its influence

Situated in the most sensitive area of the Middle East, Lebanon has long been in an unstable state. Its domestic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interwoven with the major conflicts in the region.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Syrian troops, there have been major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of Leban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upgraded its involvement and made this involvement part of its overall program aimed at regime changes of Iran and Syria. Iran and Syria would not await their doom, and have taken a series of reactive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ir political power. Leban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arenas for Iran and Syria to contes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